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冯天瑜

21

2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冯 天 瑜

人 民 出 版 社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冯 天 瑜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80,000字

1975年6月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2001·157 定价0.25元

目 录

第一章 孔丘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	1
一、贵族家世和反革命生涯	1
二、顽固维护奴隶制度的政治立场	5
三、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11
四、反动阶级的一块“敲门砖”	14
第二章 孔丘办教育的目的	20
一、为了“复礼”而兴办私学	21
二、为了“治民”而“教民”	30
第三章 孔丘的培养目标	39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分化	39
二、“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培植“守死善道”的 反动分子的教育方针	43
第四章 孔丘的教育内容	54
一、以奴隶主阶级的忠、孝观念为主旨的“德教”	55
二、以诗、书、礼、乐为内容的“文教”，以射、御为内 容的体育	63
三、农、工、军、商等实际知识被排斥于教育内容之外	73
第五章 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	80
一、“举一反三”——注入奴隶主阶级政治观念的类推教 学法	81

二、“因材施教”——为没落奴隶主阶级选“优”拔“尖”的措施	87
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	90
第六章 孔丘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97
一、儒学“礼教”成为强迫人民信奉的“宗教教条”	93
二、“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	104
三、“闭门修养”办学方式的推行	111
四、“以儒者为师”的沿袭	117

第一章

孔丘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

一、贵族家世和反革命生涯

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zōu 音邹)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 551 年，死于公元前 479 年。他是我国历史上反动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孔丘的祖先原是宋国大贵族，后因宋国发生内乱迁居鲁国。据《左传》和《国语》记载，孔丘的祖辈中，不少人都是“让国不授”、“执事有格”的保守分子。孔丘的父亲孔纥(hé 音河)，又名叔梁纥，是鲁国武士，做过地方官(陬邑宰)，其地位已不及先辈显贵，所以，孔丘出身于一个具有保守传统，而又正在走下坡路的贵族家庭。

孔丘的老家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地，素以守旧著称。而孔丘从小生活的鲁国，则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是周朝奴隶社会各种规章制度——周礼的主要制定者，他儿子的封地鲁国成为列国中旧传统最深的国家，就不是偶然现象了。春秋末期，各国的礼乐（即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崩坏不堪，唯独鲁国却专门豢养着一批“儒”，传授西周的礼仪，研究典章文物，因此，当时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称号，各国

的公卿贵族常到鲁国来“观礼”。晋国的韩宣子受聘赴鲁，看到鲁国典籍丰富、社会风俗古旧，曾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

孔丘出身于一个极端保守的贵族家庭，又生长在旧传统较深的鲁国，从小所受到的反动思想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孔丘在儿童时代，就经常陈列俎（zǔ 音阻）豆（俎、豆是祭祀时盛祭品用的器皿），做摹仿祭祀、学习礼节的游戏①，可见他受周礼的熏陶之深。

孔丘三岁时，死去了父亲，家境进一步衰落，所以孔丘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些自认“卑贱”的事情，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凡引自《论语》，都只注篇名），例如，他当过吹鼓手，替人办丧事；后来又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吏”和记帐的“委吏”②。

然而，当这些小官，不能满足孔丘恢复“周公之礼”的野心，于是，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他就聚徒兴学，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纠集一股反动势力，为登上政治舞台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但是，当时的鲁国，新兴封建主的力量已日益强大，孔丘的复古主张行不通，他只得跑到齐国去，向齐景公鼓吹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但齐国是地主经济发达较早的诸侯国，许多大夫都反对孔丘，所以齐景公只得以自己年龄老了为借口，对孔丘下了逐客令③。于是，孔丘又回到

①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② 《孟子·万章》：“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③ 《史记·孔子世家》：“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鲁国,等了十几年,仍不得见用。在这期间,孔丘继续大力从事教育活动,一些贵族子弟和其他人也纷纷投奔孔丘门下,孔家学店出现了“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的局面。这一阶段是孔丘私学的鼎盛时期。

孔丘在五十岁的时候,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地方的行政长官),第三年升为司空(工程建设部长),第四年又当了大司寇(司法部长),并曾代行鲁相职务。这前后几年,是孔丘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但是,由于孔丘倒行逆施,受到革新派的强烈反对,摄行鲁相仅仅三个月,就被季氏等人赶下了台。

孔丘被撵下台以后,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带着弟子到卫、陈、宋、蔡、楚等国周游,向各国公卿大夫兜售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由于他的学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十分不得人心,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谴责,劳动人民的反对。孔丘到卫国去,满想向卫灵公鼓吹“周公之礼”,哪知卫灵公不感兴趣,却要与孔丘谈打仗的事^①。孔丘大失所望,又跑去找卫灵公的老婆南子,企图用“走后门”的办法得到卫君的任用,但仍然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了忠实门徒子路的不满^②。孔丘的反动行径还激起了卫国人民群众的愤怒,为了表示抗议,他们把孔丘坐车辗下的辙迹都铲掉了。(见《庄子·天运》)孔丘在卫国碰了一鼻子灰,怏怏不乐地走到匡城(河南长垣一带),当地劳动人民听说孔丘这个坏蛋来了,愤怒地把孔丘包围起来,要杀孔丘,由于擅长辩说的门徒子贡苦苦哀求,才免

① 《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行。”

② 《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

于一死。孔丘被包围时，吓得要命，但脱险以后，又夸口说：“匡人他能把我不怎么样？”^①

孔丘在晚年，曾把复辟周礼的希望寄托于楚国，因为当时楚国国君楚昭王是个保守分子。孔丘在去楚国的路上，经过陈国和蔡国，被当地的封建主包围在郊外，几天吃不上饭，随从的人都饿病了（见《卫灵公》）。孔丘好不容易跑到楚国，楚昭王本想用他，但遭到大臣子西等人的强烈反对，孔丘只得夹着尾巴，离开了楚国。（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丘在列国辗转十余年，四处碰壁，其境遇正象司马迁所说的：“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他到了晚年，不得不失望地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古代迷信思想认为，凤凰没有飞来，黄河中没有龙马负图而出，就意味着事业不能成功。他还愤愤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竟想乘木排到海外去寻找出路，这是失败者绝望的哀鸣。孔丘看到从政没有希望了，在六十八岁那年，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回到了鲁国，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继续在幕后干预鲁国的政治局势，到七十二岁时，孔丘终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孔丘的一生，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的一生。鲁迅曾以幽默的笔调，概括了孔丘的反革命生涯：“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

^① 《子罕》：“子畏于匡。曰：‘……匡人其如予何？’。”

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里所说的“权臣”，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政者，“野人”和“暴民”则是指的劳动人民，孔丘受到他们的批驳、蔑视和围攻，狼狈不堪。《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当时劳动人民骂孔丘象一条“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论，联想自己的处境，也啼笑皆非地承认：“是啊，我是象一条丧家之狗啊！”^①这就是孔丘的一幅丑恶的自画像。

二、顽固维护奴隶制度的政治立场

孔丘生活的时代，我国正处在奴隶制度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到了晚期，它的全部腐朽性已经暴露无遗，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碍历史前进的桎梏。当时，奴隶劳动收获的三分之二为公室（奴隶主）所占有，即所谓的“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左传》昭公三年）。奴隶主贵族穷奢极欲，“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官仓的粮食堆积如山、霉烂生虫，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则挨饿受冻，许多人流落为乞丐，挣扎在死亡线上。《汉书·王莽传》记载，春秋战国时，奴隶在市场上拍卖，与牛

^①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sǎng 音嗓，指头部）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马同栏。这些从古籍中透露出来的事实，都说明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与牛马别无二致。奴隶们还经常遭到肉体摧残，齐国的晏婴曾对晋国的叔向说，由于齐国公室动辄对老百姓施刖(yuè 音月)刑(砍足)，所以用假足的人很多，出现了“国之诸市，履贱踊贵”的现象(《左传》昭公三年)，即假足(踊)因被争购而涨价，草鞋(履)却滞销削价。“履贱踊贵”，虽只寥寥四字，却是血淋淋的奴隶制度的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春秋战国的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550年，陈国有筑城“役人”的暴动，杀死监督筑城的奴隶主庆氏兄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20年，“百工”(即手工业奴隶)叛变周王室，把周王赶跑了(《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8年，手工业奴隶暴动，围攻卫庄公，庄公带着太子、公子跳宫墙逃跑，把腿摔断(《左传》哀公十七年)。春秋末期，山东一带还爆发了以柳下跖(zhí 音直)为领袖的大规模奴隶起义。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队伍所过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庄子·盗跖》)，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打击。跖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

奴隶起义的暴风骤雨，从根本上掀动了奴隶制度的统治基础，敲响了奴隶主阶级灭亡的丧钟，推动着我国社会向封建时代演进。

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冲破重重阻力发展起来。封建主借助奴隶起义的力量，开始向奴隶主夺权，无情地破坏着奴隶制的规章制度。总之，奴隶制社

会已经四分五裂，“礼崩乐坏”，大势已去。

孔丘生活在这个新旧社会更替的大变革时代，顽固坚持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度而奔走呼号，妄图使历史开倒车。由孔丘的徒子徒孙编写的记载着孔丘主要言行的《论语》，便是一部旧时代的挽歌、新时代的谤词。

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首先看他对人民革命的态度。孔丘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是极端仇视的。他的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制止人民“犯上作乱”。孔丘的学生子贡问孔丘憎恶什么，孔丘说：“憎恶在下位而毁谤上位的人”^①。公元前613年，郑国奴隶暴动，占据了萑苻(huānfú 音还服)这个地方，后来一个叫游吉的奴隶主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孔丘十分赞赏游吉的这种暴行，他说：“杀得好！对奴隶太宽大了，他们就要造反，奴隶造反就要严厉镇压”^②。这就充分暴露了孔丘反人民的凶恶嘴脸。

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看他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是支持还是反对。孔丘对于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采取的一切政治、经济革新措施，都是坚决反对的，他还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一)对封建主的“违礼僭(jiàn 音箭)越”行动深恶痛绝。

① 《阳货》：“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兴兵徒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春秋末期，随着奴隶制度江河日下，周天子已无力控制各诸侯国，成为尸位素餐的傀儡，而一些新兴的封建主则公然与天子分庭抗礼，一再违反周礼的规定，这是地主阶级突破奴隶制度束缚的表现。例如，按周礼规定，祭祀活动中，周天子才可以用八个队列的音乐舞蹈人员，诸侯、大夫等而下之，分别只能用六个队列和四个队列。而鲁国大夫季氏，竟擅自用八个队列的音乐舞蹈人员载歌载舞（“八佾[yì 音义]舞于庭”）。孔丘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越礼行为，怒不可遏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①。此外，按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登泰山祭祀天帝，然而季氏也跑上泰山祭天，孔丘对此也极为不满^②。孔丘知道，礼节上的僭越行为，是新兴封建主夺权的准备活动，是他们政治雄心的初试锋芒，因此，孔丘要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

（二）攻击“税亩”制度“非礼”。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也即孔丘诞生前43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度，以代替“井田制”。井田制是奴隶主阶级的土地国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完全操在大奴隶主——“王”的手里，“王”又将这些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这就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井田制下，土地是不许私有的。实行“税亩”制度，正式向私田收税，意味着王室和公室承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不再干涉土地的买卖，这样，就出现了“贵货

① 《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② 《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易土，土可贾(gǔ 音古)焉”(《左传》襄公四年)的局面，这当然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所以，“税亩”制的实行，无疑是一项进步的措施。然而，孔丘却对这一措施恨之入骨。他说：“初税亩……非礼也”，认为它违反了周公之礼，并攻击它“贪冒无厌”，比强盗还坏(《左传》哀公十一年)。这就是孔丘对当时经济制度改革所持的态度。

(三)反对“法治”，维护“礼治”。

春秋中、后期，郑、晋等国都相继实行立法改革，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晋国还制订新的法律条文，限制奴隶主贵族的某些特权，并将这些条文铸在铁鼎上面，公布于众，使贵族们不得任意改动。这就是所谓的“铸刑鼎”。孔丘对这项立法改革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他说，这样一来，晋国就要亡国了。人民从鼎上的法律条文中知道了犯罪的轻重，哪里还会尊崇贵族？贵贱没有了等次，还成什么国家^①？孔丘把维护奴隶主特权的“礼治”看成立国的根本，认为“礼治”动摇了，奴隶制的国家就要崩溃。因此，他疯狂攻击“铸刑鼎”这类政治改革措施。

(四)杀害法家先驱者少正卯。

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闻人”)，由于他兴办教育，大力宣传革新思想，深受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孔丘对他早就怀恨在心，所以孔丘摄行鲁相职务以后，迫不及待地杀害了少正卯。

^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为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至于对封建主用暴力夺取奴隶主贵族的政权，孔丘更是万分仇恨。如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国国君（即“陈氏代齐”），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从没落奴隶主阶级手里夺权的一个突出事例。当时年届七十的孔丘听到这个消息，郑重其事地沐浴一番，朝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陈恒。然而，鲁哀公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的大权早已旁落到季氏三家手里，要想用兵，必须征得季氏等人的同意。因此，孔丘向鲁哀公提出讨伐陈恒的动议，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妄言而已。^①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孔丘是一个没落奴隶制度的忠实卫道者，他一生东奔西窜，都是为了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尧曰》）的目的，即复兴已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延续下去，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当权。

但是，事与愿违，奴隶制的垮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孔丘这个逆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尽管遭到惨败，面对奴隶制度无可挽回的崩溃趋势，还自我解嘲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意思是说，到了奴隶制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刻，才看得出我孔丘是最忠于文、武、周公之道的啊！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是一个明知做不到，却硬要去做的死顽固^②。这是对孔丘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① 《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② 《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三、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孔丘的理想社会，是奴隶制极盛的西周。那时诸侯听命于天子，上下等级分明，“名正言顺”。《礼记·坊记》载有孔丘对自己理想社会的描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为了恢复这个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社会，孔丘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哲学观点，其核心内容是“仁”，而仁的政治目标是“复礼”。

“仁”，从广义而言，包括孔丘思想的全部，讲的是如何做一个符合奴隶制政治、道德规范的人。孔丘认为，一个忠于奴隶制度的人，不可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违背“仁”，在仓卒忙乱时不能违背“仁”，在颠沛流离时也不能违背“仁”^①。为了维护“仁”，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②。可见，“仁”是孔丘最高的理想境界，是他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东西。

孔丘关于“仁”的解释很多，《论语》中提到“仁”共有105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在答复樊迟的问题时提出来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丘说“仁”就是“爱人”。那么孔丘爱的是什么人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孔丘是爱一切人。这种论断是十分荒谬的。毛主席指出：“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827页）其实，孔

① 《里仁》：“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② 《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丘所谓的“爱人”，是指的爱奴隶主。对于“民”（指奴隶），孔丘是当做财物、牲畜看待的；对于“小人”（指其他劳动者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孔丘也充满了厌恶，他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就是明证。一部《论语》中，孔丘谩骂“民”和“小人”，达几十处之多。可见，孔丘决不是一团和气地爱一切人，而是“爱有等差”。他所谓的“仁者爱人”，就是企图用奴隶主相互间的爱，来加强奴隶主内部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统治、镇压“民”和“小人”。

“礼”，则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说的，指的是奴隶制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其中心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等级制度^①。孔丘认为，这一套清规戒律不可稍有违反。他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要求人们在礼的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视、听、言、动都不得越出周礼的规范。

孔丘的政治思想尽管相当复杂，但其要害是复辟，是使历史开倒车。孔丘的得意门生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仁”是孔丘的最高“理想境界”。他认为，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只要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你的统治。孔丘还常以不能梦见制订周礼的周公而深感遗憾。可见，恢复那个腐朽不堪的西周奴隶制度，便是孔丘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

哲学思想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为一定的政治思想

^① 《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